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马建标 林 曦

摘 要：在 19 世纪以降的中美关系史上，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不乏其人，如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等人。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显得与众不同。在中美关系史上，他的跨界经历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从政的缩影。作为学者，芮恩施的学术思想为 20 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他利用美国政治学会对中美关系施加学术影响；他利用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来处理一战时期处于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并因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作为跨文化者，芮恩施虽有促进中美沟通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以美国强势文化的姿态来“帮助”中国的弱势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以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会学者群体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带有浓厚学者气息的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鼓吹的“平等”与“自由”等道德价值，实质上仍是代表美国强势文化的西方价值。

关键词：芮恩施 跨文化者 中美关系 进步主义

在冷战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时期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尽管已经去世多年，美国学术界仍对他采取批判态度。在冷战斗士看来，作为一位资深中国通，芮恩施出使中国期间的外交作为可谓“一无是处”。1951 年，埃兰·E. 坎特宣称：“尽管芮恩施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却不是一位优秀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在驻华公使任期内的外交行动是错误的，值得批判的。随着远东问题成为国际事务的前沿问题，我们早期驻华公使的外交缺点值得重新思考”。^①

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是中美关系作为主宰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中美两国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别关系，在两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东方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和问题，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都在深刻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走向。一百多年前，芮恩施远涉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适值一战爆发，旧有的列强在华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试图独霸东亚，导致美日冲突加剧。芮

^{*}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进步主义与中美关系：美国政治学会领袖在中国的经历”（16PJC014）的中期成果，并获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A 类课题资助。

^① Alan E. Kent, “Down from the Ivory Tower: Paul Samuel Reinsch, Minister to China,”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35, no. 2 (Winter 1951), p. 114.

恩施置身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漩涡，他作为外交官的个人经历已与这段历史融和在一起，并成为 20 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民国对外关系史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正如入江昭（Akira Iriye）所言，“这些中国通的经历凸显了美国远东外交的复杂意图和实践。此外，他们及其同僚们的生平、职业为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彼此交错互动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① 他们的经历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美国史、中国史或者中美关系史，还涉及跨国界的文化融和。申言之，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思考的问题，是对人类命运的根本关怀问题。

芮恩施是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且颇有争议的人物，其担任驻华公使期间也正是中美两国及双方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国外对芮恩施虽已有较多研究，但主要存在两种缺陷：一是研究者对芮恩施的论述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视角，忽略了跨文化身份在他处理中美关系时所面临的种种遭遇；二是国外的早期研究没有利用馆藏于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没有注意到芮恩施担任北京政府顾问期间所面临的身份挑战。中国学界对芮恩施的研究非常不足，兹不赘叙。^② 本文尝试运用跨国史方法，考察芮恩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其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以及建立在其不同身份基础上的不同经历。具体言之，本文着重考察三个方面：首先，作为 19 世纪末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芮恩施如何从学者的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问题，他的这一学术思想经历又如何影响了美国的远东政策及其实践？其次，作为一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公使，学者与外交官这一双重身份究竟对其外交行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再次，作为一名跨文化者，芮恩施卸任驻华公使以后在沟通中美两国文明上作出的尝试及其文化遭遇。

虽然芮恩施在一战期间身为美国驻华公使，这一官方职位使其在中美关系的开展上不得不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束缚，但是他的学者身份意识、进步主义观念及其超越政界、学界、国界的跨界经历又使得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并带有深厚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精神烙印。换言之，今日重新考察芮恩施的多种身份对一战前后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的别样意义。^③

一、跨界的缘起：芮恩施与进步主义时代的学术和政治

芮恩施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著名政治学者，对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最优秀的人应该去改革政治或者投身政治，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位于

① Paul Gordon Lauren, ed.,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 81.

② 参见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Millwood, N. Y.: KTO Press, 1979;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New York: 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Press, 1952; 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研究范式中，包括外交公使或者大使在内的外交官往往也只是政府外交活动的“配角”，由于把“民族国家置于中心地位”而忽略了这些特定历史人物的个体经验。诚如王立新所言，跨国史在民族国家之外创造了一种“新历史”。这种“新历史”通过再现历史边缘人的经历和价值，具有重建史学正义的意义。详见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关于其他进步主义领袖对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塑造，另见王立新：《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历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独树一帜,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楷模。芮恩施1869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他在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堡垒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之后,在时任院长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的支持下,1899年留校任教,直到1913年出任驻华公使。芮恩施的治学理念深受其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影响,特纳的边疆理论成为吸引他关注美国远东政策及远东问题的思想源泉。

如果说1913年芮恩施弃学从政、出任驻华公使,是一次从学界到外交界的跨界,那么他在十多年前以一个深受欧美文化熏陶的德裔美国人身份研究远东问题,并以此作为其毕生的研究志业,则是一次文化上的跨界。如果没有之前的跨文化研究体验,也就没有他后来职业选择上的跨界。芮恩施早前关于远东问题的出色研究奠定了他在美国学术界远东问题专家的权威地位,这段研究经历中所形成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学术观点成为他出任驻华公使期间指导其外交决策的重要思想原则。因此,芮恩施关于远东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想经历,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跨文化个体思想体验,不仅是他处理中美关系的前史,也是后人在研究一战时期中美关系时经常容易忽略的一部分。

从文化背景上看,芮恩施是一个地道的欧美文化熏陶出来的学者。他是一位幸运儿,他的两位导师伊利和特纳分别是美国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伊利的社会改革思想引导芮恩施致力于谋求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特纳传授给芮恩施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并引导他发现潜藏于人类社会进步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力量。^①1898年6月,芮恩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到欧洲访学,先后旁听了莱比锡、柏林、罗马和巴黎等地著名大学的课程,1899年春返回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此次欧洲游学经历使得芮恩施确信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并将在政治、艺术和文明上发生大变革,他深感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对远东的疯狂瓜分,尤其引起了芮恩施的关注。早在1897年夏,他就开始酝酿一个宏大的题目——远东问题与世界政治。^②

1900年9月,当国务卿海约翰发表他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不久,芮恩施的成名作《世界政治》又再版了。^③实际上,《世界政治》一书其后在英美两国多次印刷,并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一部关于远东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这部书令芮恩施声誉鹊起,使其成为蜚声国际的远东问题专家;他应邀出席各种演讲,为流行刊物发表评论,忙得不亦乐乎。^④《世界政治》一书作为芮恩施的成名作,集中体现了他在20世纪初期对远东问题的思考。若要更好地掌握芮氏写作此书的思想意图,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渊源。

芮恩施《世界政治》一书的重要理论视角是当时盛行于欧美文化界的东方主义,而他的创意是把东方主义引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中。^⑤对西方文明而言,东方主义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萨义德认为,“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发明,那里自古就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充满异域情调,令人魂牵梦绕,那里有各种不同寻常的故事”,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东方是一种别样的感

①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9.

②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p. 9-10.

③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0.

④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V, December 1900, pp. 719-722;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12.

⑤ “Orientalism,” *The Medical Critic And Psychological Journal*, vol. 1, no. 4 (October 1861), pp. 603-604.

受，东方主要是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① 19 世纪末，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们对远东问题的看法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与欧洲大陆传统的东方主义相比，已经有所不同。对芮恩施而言，远东问题“不仅是一个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长期对抗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关怀问题，即谁来领导，谁将获胜，谁能代表西方与东方交往，并不可避免地与东方发生冲突”。^② 显然，在对待远东问题上，美国人还要与同属西方的欧洲人竞争，美国人自认为他们最有资格代表西方来与东方竞争。至于东西方竞争的结果，美国学者们很自信地认为，当然是西方获胜，也即美国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胜利。^③ 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就是“对个体的尊重”，这一原则是西方主义的本质。当他们用这种标准去看待东方时，他们发现东方主义“只是尊重皇帝的权威，忽略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西方主义则认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最高目标”。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具有文化上的内涵。

芮恩施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他说：“不出所料，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终于发生了，而要化解这两大文明的冲突，事不宜迟；无论东方与西方之前是否相遇过，这都是一场争夺人类文明领导权的生死较量”。^④ 当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发生之后，人类文明将面临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第二，西方文明被东方文明征服；第三，两大文明通过融和发展成一个更先进的人类文明。最终，上述三种可能性都取决于欧美列强的政治行动。芮恩施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列强采取的任何政策都会导致最广泛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列强的政治行动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⑤ 与印度不同的是，“有教养的印度人虽然把英国人当作掌握政府艺术的专业的野蛮人，但是在文化方面，他们认为英国人仍处于孩童期”，但是在中国，中国人与列强的种族关系是另一回事。芮恩施指出，“中国是一个对待外人更加温和的地区，中国会允许甚至欢迎欧洲人来调停。因此，与印度相比，中国可以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加直接、更加深远的关系”。为了人类文明命运的共同福祉，列强必须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协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确保中国接纳西方的文明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列强要遵守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实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和平交往的桥梁。^⑥ 相反，如果列强想通过对中国的瓜分来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那么人类就会陷入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一个绝对的世界帝国的出现，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可怕的专制帝国，而人类文明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⑦

要阻止东西方之间发生“文明的冲突”，芮恩施认为，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替代列强的“瓜分政策”；其二是用西方的工业主义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尽管中国不会轻易地向西方文明的入侵屈服，但是最容易最保险的办法是改变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方

①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2003, p. 1.

② Benjamin Ide Wheeler,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Israel S. Clare, *Library of Universal History*, New York and Chicago: Union Book Company, vol. x, 1899, pp. 3371-3372.

③ Benjamin Ide Wheeler,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3371-3372.

④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 86.

⑤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 237.

⑥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 241.

⑦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 245.

式。芮恩施说,“中国人很关注日常生活的改善,只要有任何实际的生活好处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利用它。毫无疑问,西方工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将会畅通无阻。电报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铁路在几年之内也将发展起来。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矿业也在进步。随着这种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也将发生预期的变化”。^①

尽管芮恩施在他的《世界政治》一书出版时还深受“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但是随着对远东问题研究的深入,他开始转而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可以“调和的”,主张进行“文化合作”。^② 芮恩施经常批评西方人特别是白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理解“东方文明”。^③ 他指出,东方的传统工业是家庭手工业,这是一种充满创新精神的家庭手工艺。他说,当人们考虑到亚洲文明的基本观念和习俗时,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亚洲按照自己的模式自然地发展下去,那么她绝不会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④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黄祸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芮恩施对此批评说:“黄祸论是我们的主观臆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这两种文明可以相得益彰……东方哲学的一元论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西方科学体系所借鉴和吸收。只有那些观念狭隘的人才会认为西方必须遏制东方文明的威胁。”^⑤ 为什么芮恩施能够很快地摆脱他之前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并转而以同情的态度来寻求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融和,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很关键,那就是他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观念。自儿时起,芮恩施的日常生活就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他的家庭严格遵守路德教义和诫命。成年以后,他仍然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参加周日的礼拜聚会,尽管他从不归属任何一个特定的教派。此外,他经常引用《圣经》经文,宗教训练使他发展出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观念,进而影响他一生的行为方式。^⑥

20世纪初,芮恩施因《世界政治》一书而声誉鹊起。随后,他与其他学者一同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此时,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政治学组织,就像历史学会和经济学会那样,可以为本学科服务”。^⑦ 受这种愿望的驱使,1902年12月30日,一批政治学者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他们最初考虑成立一个“美国比较法研究会”。但是,他们考虑到“社团”一词太狭隘,华盛顿会议参加者决定先成立一个“筹委会”,由康奈尔大学的精琦教授(Jeremiah W. Jenks)领衔,研究“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涵盖政治学领域全部问题的组织的必要性”,此筹委会共由15名学者组成,芮恩施名列其中。^⑧ 精琦教授领导的筹委会经过一年的努

①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p. 245-246.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p. 43.

④ Paul S. Reinsch, “Japan and Asiatic Leadership,”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80, no. 578 (January 1905), pp. 53-54.

⑤ Paul S. Reinsch, “Japan and Asiatic Leadership,” p. 57.

⑥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5; Lauros G. McConachie, “Paul S. Reinsch,” *World Today*, July 31, 1906.

⑦ W. W. Willoughb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9, no. 1, 1904, p. 109.

⑧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67, p. 51.

力，1903年秋季宣布将在年底与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在新奥尔良召开联席会议。^① 1903年12月30日，25名学者聚集在杜兰大学的提尔顿图书馆，表决成立美国政治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弗兰克·古德诺教授当选为会长，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教授当选为第一副会长，但未就任；于是，第一副会长由芮恩施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韦罗贝当选为学会秘书。^②

不可否认，芮恩施和古德诺等人发起成立美国政治学会，其初衷自然是为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通过学会的建立以便更好地寻求学界与政界的互动。作为首任会长，古德诺鼓励会员们以个人名义参与公共事务和公民教育。古德诺还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明尼苏达州的斯切普（W. A. Schaper）担任会长，专门调查“如何培养美国青年的公民民主观念”。^③ 后任会长艾伯特·萧也鼓励学会同仁“抓住一切机会去影响政治家，同时向美国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他甚至还要求美国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与政治学者联合起来“共同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④ 此外，政治学会的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从创刊之时就设置“当前立法问题评论”专栏，引导学者关心现实事务。^⑤ 如杰根·赫伯斯特所言，“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积极地参与并引导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特征”。^⑥ 根据1904年的一项统计，美国政治学会有五分之三的会员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另据1914年的统计，根据仅有的57个会员资料，至少有34人参与政治事务。^⑦

美国政治学会为芮恩施提供了一个进步主义学者参与政治的宝贵平台，而他的学术研究则越来越聚焦在中国方面。在此期间，芮恩施对中国的关注有增无减。他在任教威斯康星大学期间，培养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其中也不乏中国留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坦利·亨贝克——美国未来的远东司司长。这些人成为芮恩施积极推行的“威斯康星在中国”计划的重要成员。^⑧ 通过他们不断地提供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情报，芮恩施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经过数年的思考，芮恩施在1911年出版了他关于远东问题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与之前的《世界政治》一书不同，芮恩施的新书超越了他之前的“文明的偏见”，以更加同情的理解态度评判远东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从1900年的《世界政治》到1911年的《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在这11年里，芮恩施的学术关怀日益表现出他力图超越东西方文明的“鸿沟”、努力建构人类新文明的“跨文化身份”意识。他希望通过对东方文明的研究，来探求实现人类“终极大同”的可能性。他说：“人类的

①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p. 52.

② W. W. Willoughb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 110.

③ McCoy Hall,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the Section on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2, 1905, pp. 207-228.

④ Albert Shaw,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Baltimore: The Waverly Press, vol. 1, 1907, pp. 182-183.

⑤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p. 84.

⑥ Jurgen Herbst,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62.

⑦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p. 83.

⑧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1, Preface, viii.

终极大同愿望是东方思想最本质的表达，这与我们西方文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与我们心心相印”。^① 芮恩施的世界大同理想追求反映了他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国际冲突的忧虑，他希望从东方文明中找到拯救人类文明的希望。如他所言，“东方也有大同观念，有共同的理想与情操，这些不是孤立的，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生活”。^② 芮恩施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治制度，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个人主义是自我克制的结果，由此发展成民主制度。虽然东方没有个人主义传统，但是在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之中，中国是最真实的民主之乡。虽然中国的政府不是民主制度，但是其办事方式是民主的”。^③ 通过这种“跨文化”研究，芮恩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国际身份”意识，他把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和平交融作为其对华政策的目标。^④ 他认为，要实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理解，只需要发挥人类的“智慧、耐心和善意”就可以了。^⑤

在芮恩施看来，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是美国开拓其在远东“新边疆”的最好的外交政策。门户开放原则也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道德义务”，美国要保护中国避免被列强瓜分，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但是中国必须接受美国的自由贸易理念。芮恩施的理想就是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顺利执行，最终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平竞争、国际合作、进步与繁荣，同时消除武力冲突、阴谋、浪费和贫困。^⑥ 到了1913年，芮恩施终于迎来了学者参政的天赐良机。这一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几位重要人物都参与到政治中。他们的参与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史。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麦卡锡教授在1913年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报告里这样写道：

威尔逊教授当选总统，威斯康星大学的芮恩施教授担任驻华公使，哥伦比亚大学的穆尔（John Basset Moore）教授担任国务院法律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受聘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亨利·C. 亚当斯（Henry C. Adams）教授受聘中国交通部专家顾问，协助中国铁路预算系统的建立——所有这一切表明大学与公共事务之间的互动，可谓是硕果累累。^⑦

毋庸置疑，1913年美国政治学会原会长威尔逊当选为总统，把进步主义时代的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推向了高潮，进步主义的学界领袖们似乎也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巴特勒不无自豪地说：“大学对现代国家的功用就是大学教授们通过与政府的联系或者各种各样的自愿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在世界所有的大学中，美国大学教授们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规模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⑧

无论怎么看，1913年都是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学者参政的一个转折年份。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威尔逊在这一年开始了他为期八年的总统生涯，同时他委任另一位进步主义的同道

①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p. 36.

②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p. 40.

③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p. 55.

④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2, p. 60.

⑤ “Voice Friendship For Eas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1913.

⑥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79.

⑦ Charles McCarthy,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ractical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i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 Its Tenth Annual Meeting, held at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30, 1913-January 1, 1914, vol. 10, 1914, p. 318.

⑧ Charles McCarthy,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ractical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ice,” p. 319.

芮恩施出任驻华公使。随着芮恩施出使中国，他自然地把进步主义的精神理念运用到中美关系的实践中。一年后，一战爆发，原本不关心外交事务的威尔逊总统被迫卷入日益复杂的国际纠纷中，试图用进步主义精神改造被战争破坏了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这样，无论是在全球国际关系的变革上，还是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上，美国进步主义的两大精神领袖威尔逊和芮恩施都身逢其时，他们将以其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气质来改造中美关系。

二、模糊的身份：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期间的身份交叉

芮恩施在进步主义时期的中美关系上具有多种身份：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其中，学者身份更多地影响到他如何看待自己前往中国的使命观。在担任驻华公使期间，芮恩施的多种身份与他的对华外交政策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引发其个人的身份冲突。

1913年11月，芮恩施抵达北京。在其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芮恩施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有不同，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裂缝和冲突，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于是在芮恩施本人的中国观和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之间，就出现了一条灰色地带。这就给芮恩施本人理解和执行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资操作的灵活空间。^① 威尔逊和芮恩施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本有一些共同的立场。比如，他们都认为美国应该对新生的中华民国肩负起道德导师的责任。威尔逊本人也是一位政治学家。他在1910年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这一共同的学术身份也使威尔逊坚信，芮恩施会是自己在中国的“替身”。^② 威尔逊和芮恩施都认为有必要支持岌岌可危的北京政府。其他两位美国政治学会的领袖人物——古德诺和韦罗贝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只有让中国政府强大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即便这意味着要容忍袁世凯逐渐扩大的“帝制”胃口。^③ 因此，威尔逊和芮恩施都强调，美国应当为中国树立一个榜样，应当在中国实行共和制。但是，在涉及日本在华特殊利益时，威尔逊和芮恩施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不可弥合的分歧：芮恩施强调要遏制日本，而威尔逊总是希望在亲日派和反日派之间达致某种平衡。

正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分歧，才导致了芮恩施本人的对华立场变得模棱两可。我们实际上难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确定在芮恩施身上究竟哪一种身份是占主导地位的。为了探究其不同身份的作用和影响，我们需要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芮氏本人的心理因素进行一个综合研判，这样才能看到究竟哪一种身份在何时何地对其产生了影响。

身份不仅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认知，而且也牵涉到他者对我们的认同。对于芮恩施而言，情况亦然。由于芮恩施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东方学家，故而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提到芮恩施，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学者身份，而不是他作为外交官的身份。比如，美国在华商会就对芮恩施出使中国信心不足，他们认为芮恩施不过是一个学者，而且仅仅因为他与威尔逊总统有联系，所以才能担任驻华公使。由于威尔逊也是学者，这更加重了美国在华商会对芮恩施本人外交能力的怀疑。

实际上，上海美国商会并不是特别“待见”芮恩施，而且在他借口说公务繁忙没法听取该商会意见之时，美国商会感到非常恼怒。在上海的美国报纸《大陆报》(*China Press*)刊文抨击

^①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73.

^②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 123.

^③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 123.

芮恩施,认为如果他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华,那才算称职。言下之意,芮恩施并不能胜任美国公使这种重要工作。如前所论,在外界的印象中,芮恩施的学者身份是最突出的身份。至少在外界看来,他的学者身份对他是否能够胜任外交使节这一工作,投下了些许阴影。美国在华商会就明确表示他们怀疑芮恩施能够胜任这一工作。有人曾安慰芮恩施说,“商人总还是会有点妒忌文人的”。^①

有趣的是,其他列强如法国和俄国也认为芮恩施的学者身份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坚信,芮恩施的学者身份观念仍然会影响到他在华的外交行为。在芮恩施抵达北京的当天,法俄两国公使馆的喉舌《北京新闻》(*Le Journal de Pekin*)就发表了对芮恩施十分“不客气”的评论,认为他不该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批评法国人在远东屈从于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俄国的“卫星国”。这份报纸还批评美国外交的特点就是“虚张声势”,而芮恩施就是这一特点的“集大成者”。^②

随着一战的爆发,日益尖锐的远东国际冲突使芮恩施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当时,威尔逊正因墨西哥革命和欧洲战争而一筹莫展,他和国务卿(先是威廉·布莱恩后是罗伯特·兰辛)也像当年的老罗斯福和塔夫特总统一样,想要向亲日派作出妥协。^③日本在1915年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激化了美国亲日派和反日派之间的冲突,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面临严峻的挑战。^④1915年2月8日,威尔逊给芮恩施写了一封私人密函,他如此说道:“对中国当下的时局,我进行了深思,其中涉及日本的要求,我已经尽我所能,想要间接地为中国谋利益。我现在有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直接对华建议,或者在目前的谈判中直接干预为其谋利益,那实际上会帮倒忙,而且,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引起日本妒忌和产生敌意,中国会首当其冲并因此蒙难。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扮演谨慎的友人的角色,就是确保英国代表意识到局势的紧张以及我的所思所虑。就目前来看,我会密切注意局势,时机一旦成熟,我立即就可以介入远东局势”。^⑤既然现在只有和平手段而非动用武力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原则,那么芮恩施就必须使用特殊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其挫败日本二十一条的目标。^⑥

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芮恩施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手段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双重身份: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代表和中国政府的私人顾问。换言之,芮恩施有意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游走,充分利用美国驻华公使和专家学者这两种身份给他带来的种种便利。他不断地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各种后果作出预判,并强烈支持美国要积极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他又积极接触北京政府外交部,针对如何绕过日本的策略和要求提出了

① “Editorial,” *China Press*, cited in *The 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 December 19, 1913; “Report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vol. XIV, March 1914, pp. 36-37.

② “The Attack On Dr. Reinsch,”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November 22, 1913, p. 563. 另见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 61-62.

③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p. 210.

④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 129.

⑤ *Harper's Weekly*, LXII, Jan. 1, 1916, p. 1; Wilson to Reinsch, Feb. 8, 1915,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 32, 1980, pp. 196-197.

⑥ Eleanor Tupper, *Japan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 pp. 114-116.

许多意见。^① 如果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芮恩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积极游走，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外交案例。在 1915 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我们还可以通过两个具体的实例，来看芮恩施如何充分利用他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各个不同的“场域”之间游走，施展其才能。

首先是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泄密。虽然日本政府恫吓中国政府，要求后者不能在两国结束二十一条谈判之前将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告诉其他国家。但是，日本的外交动作还是通过秘密渠道被透露了出去。1915 年 1 月 23 日，芮恩施了解到了日本所提要求的细节，他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强调日本的外交阴谋威胁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他不无担心地提到，如果中国没有同意日本提出的要求，那么日方就会煽动革命军叛乱，这将为日本出兵占领中国提供口实。^② 同时，芮恩施试图与中国政府保持紧密联系，而中国政府也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在中国政府和美国公使馆之间扮演了一个消息传递者的角色。正是通过顾维钧，二十一条消息才从中国政府传递到芮恩施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顾维钧和芮恩施之间的秘密往来有所察觉，但是他无法确认顾维钧将消息透露给芮恩施。^③ 可以说，芮恩施才是此次“外交泄密”的真正主谋，而顾维钧则是中国政府中负责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芮恩施的人。

起初，中国政府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所以“尽全力保守秘密”。^④ 但是，在芮恩施暗示说应当把消息“透露”出去之后，中国政府才公开日本的秘密要求。从 1 月 22 日起，北京的各大报纸开始讨论日本所提出的要求。^⑤ 因为芮恩施没有办法及时地获得来自华盛顿的指示，他没有办法告诉中国政府，对此美国政府会全力支持。换言之，在某些时候，芮恩施作为美国驻华公使，其实也无能为力。但是作为私人朋友和国际法专家，他还是有许多施展才能的空间。实际上，他本人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为之，芮恩施事后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同情地聆听他们想要诉说的任何话题，并给他们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参考意见”。^⑥ 芮恩施本人也深刻地意识到他自己身份的模糊性，他也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来尽量帮助中国。另一方面，在顾维钧和其他中国官员的安排下，芮恩施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可靠的外国记者。^⑦ 1 月 25 日，《纽约时报》开始报道日本二十一条交涉情况。^⑧

但是，芮恩施和中国政府的“泄密”举动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阻挠。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甚至还抗议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失实”，但是又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什么信息有误。^⑨ 起初，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新闻报纸被日本“言之凿凿”的各种“否认”姿态给说服了，因此把报社派驻北

①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91.

② Reinsch to Bryan, January 23, 1915,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 1969, p. 79.

③ Paul S. Reinsch, "Secret Diplomacy and the Twenty-One Demands," *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the Orient*,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Company, vol. 21, 1921, p. 939.

④ Paul S. Reinsch, "Secret Diplomacy and the Twenty-One Demands," p. 938.

⑤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p. 105.

⑥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 144.

⑦ Reinsch, "Six Years of American Action in China," Reinsch Papers; Noel H. Pugach's interview with Koo, February 24, 1965; Koo to Noel H. Pugach, June 29, 1965, quoted in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p. 149, 159.

⑧ "Japan Makes Big Demands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1915.

⑨ Reinsch to Bryan, February 1, 1915, *FRUS*, pp. 81-82.

京记者发回的报道全部暂缓发表。^①在看到英国和美国政府都不愿采取任何行动之后,芮恩施和北京政府都意识到,“舆论是我们手里的唯一武器”,于是中国通过各种方法把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直接透露给了中外记者。^②英美媒体最终明白了日本二十一条的真相。芮恩施和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紧锣密鼓地合作,把消息透露出去,这一做法不但成功地扭转了国际舆论的转向,还让国际媒体开始批评日本,同时又促成美国和其他大国质问日本是否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最终日本被迫承认存在这一事实。^③

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的官方支持,芮恩施竭尽全力,发挥了自己在各个领域中的人脉和社会资源。芮恩施本人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卫理(E. T. Williams),他和芮恩施持相同立场,两人都是“反日派”。卫理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在他的帮助下,芮恩施成功地让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切的一个议题。在芮恩施于1月23日撰写的首份报告到达国务院之后,^④卫理很快就在1月25日写了一个内参给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讨论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严重事态”。^⑤两天后的1月27日,卫理又给布莱恩写了一份内参,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敦促政府尽快对日采取行动。^⑥卫理的内参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1月28日,布莱恩给芮恩施发了一封电报,说中国事务已经得到了高层“密切和及时的关注”,芮恩施要及时地把所有情况都通报给国务院。^⑦

其次,芮恩施尽力阻止日本在美国内部孤立中国的企图。^⑧2月中旬,芮恩施已经对华盛顿的迟钝感到厌烦,他开始主动出击。而且,芮恩施也意识到,他很难避免给中国政府这样一种暗示,就是美国有可能会以友邦的身份介入进来,以期实现更大程度的国际正义。^⑨当然,芮恩施的个人活动让中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美国政府和中國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友邦情谊”。

芮恩施本人当然深知这一情况,对于他而言,最大的担心在于中国对美国政府信心不足。实际上,中美这种特殊的“友邦情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芮恩施本人的努力。真实的情况是,尽管威尔逊总统强调美国对中国担负有“道义责任”,但是威尔逊本人觉得,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一方面,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芮恩施尽了最大可能去掩盖如下真相:美国政府有可能不愿意帮助中国。可以说,在芮恩施本人和中国之间存在某种“特殊情谊”,他愿意尽其所能来帮助中国。但是,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就不存在这种“特殊情谊”了。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政府和芮恩施本人在对华态度上的差异。当然,日本很想让中国了解,美国不会干预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比如,在讨论

①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p. 106.

②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149.

③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 149; Paul S. Reinsch, *Secret Diplomacy: How Far Can It Be Eliminat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 p. 126.

④ Paul S. Reinsch to William J. Bryan, February 1,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169-171; "Enclosure," January 26,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137-138.

⑤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p. 107.

⑥ E. T. W. to WJB, "Memorandum: The Crisis in China," January 27,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135-137.

⑦ Bryan to Reinsch, January 28, 1915, *FRUS*, p. 80.

⑧ Li Tien-y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 p. 121.

⑨ Reinsch to Bryan, April 5, 1915, *FRUS*, pp. 119-122.

到福建问题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指责北京在“讨好”美国政府。^① 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甚至宣扬美国已经默认了日本提出的要求。^② 日本显然试图打压中方对美国的信心。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地让中国对美国失去信心，那么中美之间这种特殊“友邦情谊”的迷思也就自动破除。

芮恩施很希望能够化解日本的宣传攻势，他了解到，威尔逊总统及国务卿布莱恩总是倾向于在反日派和亲日派之间保持平衡，因为从官方的角度来讲，美国不可能对日本采取一个抗议的政策。为了对抗日本的宣传攻势，芮恩施强调，他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能够授权他，“以非正式、非个人和非官方的形式，在中国公之于众；让人们知道美国政府既不放弃自己在华的实质利益，也不放弃自己对华的道义责任”。^③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威尔逊总统总是认为美国对中国担负有特殊的道义责任，他从未试图去放弃这种道义责任。因此，芮恩施的问题就是如何设法打动威尔逊总统。4月14日，威尔逊在给布莱恩的一封信中坦诚相告，“按照芮恩施先生所报告的情况来看，目前局势的发展让我非常不安，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不相信日本给我们的保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机会，向日本大使表达我们的严重关切，了解到日本政府正在坚持向中国政府灌输我们默认这些‘要求’的想法，因为，这些要求很显然违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独立和自主，并且也违反了全球门户开放政策。简而言之，我认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当积极主张中国的主权，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而且，我们心里不是为了给我们自己争取任何特殊利益或特权”。^④

因此，4月15日，布莱恩授权芮恩施以非正式和非官方的方式作出如下声明，“美国政府并未放弃任何其在华条约权利，也未曾减少其作为友邦对中国工业和政治福祉的关切。美国正在等待目前谈判的结果，她满怀信心地期待，美国的权利和义务不会受到影响，其利益不会受到损害”。^⑤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逊越来越意识到公布美国对日本要求之看法的重要性。4月27日，他告诉布莱恩，“人们普遍误解了我们对这些重要事务的立场，而且人们对此作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将我们的看法公诸于众，也许应该联合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国家”。同时，威尔逊要求布莱恩“对芮恩施作出指示，向中国政府保证，美国同情中国拒绝那些过分侵犯其主权、行政独立或其领土完整的要求”。^⑥ 4月28日，布莱恩回复威尔逊，称“没有一个盟国愿意加入我们，力挺我们的所言及所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我们自己开展行动；但是我们要确保如果我们的盟友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我们的行动予以支持”。^⑦ 同日，威尔逊回复布莱恩，“我敢说你是对的”，威尔逊总统同意布莱恩私底下送一封书信给日本大使，其中提到美国政府有可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其

① “Enclosure I,” P. S. Reinsch to William J. Brya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pril 14,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 519.

② Wilson to Bryan, April 14,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520-521.

③ “Enclosure I,” P. S. Reinsch to William J. Brya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pril 14,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519-520.

④ Wilson to Bryan, April 14,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520-521.

⑤ “Enclosure II,” April 15,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 520; Wilson to Bryan, April 27,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3,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1.

⑥ Wilson to Bryan, April 27,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3, p. 81.

⑦ William J. Bryan to W. Wilson, April 28,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3, pp. 82-83; W. Wilson to William J. Bryan, March 25,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2, pp. 432-433.

方式是向欧洲列强发布照会。^① 无奈, 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美国的表态对于二十一条交涉已经没有实质性帮助。

如果说 1915 年中日谈判期间芮恩施在其作为学者的个人身份和作为美国公使的官方身份之间保持了一个良好平衡的话, 那么在 1919 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他就会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身份挑战。^② 芮恩施对巴黎和会非常重视, 1919 年 1 月 6 日给代理国务卿弗兰克·波尔克发送了一封加长电报, 要求后者将该电报提交给威尔逊总统。芮恩施建议, 巴黎和会必须包括“对中国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③ 芮恩施对巴黎和会的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毕竟, 巴黎和会是一次战胜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博弈, 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在英法日等强国元首的围攻下, 势单力孤。在 1919 年 4 月 28 日的四人会议上, 威尔逊为争取日本加入国联, 以牺牲中国的山东主权为代价, 被迫对日本作出妥协。^④

在了解真相之后, 芮恩施在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从北京发送了三封电报给华盛顿的波尔克, 后者把这些电报递交给了时在巴黎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芮恩施在 5 月 1 日的电报里面说, “北京政府接到了来自巴黎的快报, 大致说明了和谈就山东问题达成的决议, 但是令他本人难以置信的是, 五个协约国竟然会对中国作出如此不公正的决定”。在 5 月 2 日的电报中芮恩施说, 他意识到从巴黎来的快报是确凿的消息。他接着评论说, 中国“官民共愤, 在面对这样一个否认其基本权利、同意最无情和无耻的侵略行径的事实面前, 他们显得异常无助。代理外交总长陈篆称, 政府没法同意这样一份条约。他们准备指示代表团不要签署, 虽然他们担心会有打击报复, 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日本军事淫威之下。他们担心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大暴动, 全民都会愤怒和失望”。芮恩施警告说, 和谈提出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有可能会在中国掀起“一场狂暴的排外运动”。如果日本对华侵略政策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 那么日本就会在亚洲获得压倒性的声望, 再过几年, 它就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 5 月 3 日的电报中, 芮恩施说, “北京、山东、上海的民众群情激昂。今明天都有大型抗议集会。所有的呼吁都可以被归纳为如下讯息: 我们呼吁政府立即指示中国驻巴黎代表团不要在和谈条约上签字”。^⑤ 5 月 7 日, 兰辛给威尔逊写信, 告诉他, “在媒体报道日本对山东的主张之决议之后, 中国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⑥

遗憾的是, 芮恩施的双重身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在芮恩施和威尔逊之间, 已经出现了裂缝, 芮恩施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使芮恩施和威尔逊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在巴黎和会上, 威尔逊总统尽量让自己和他人相信, 只要接受了条约, 山东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前提是日本遵守其承诺, 即“将山东半岛恢复至中国的完全主权之下”, 而只保留经济权利。芮恩施认为, 这是威尔逊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豪斯上校和威

① Wilson to Bryan, April 28, 1915,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33, p. 85.

② Robert Lansing, *War Memoirs*,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35, pp. 281-282, 284.

③ Joseph Clark Grew to Gilbert Fairchild Close, with Enclosure, January 15, 1919,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54,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7-83; Frank Lyon Polk to Joseph Patrick Tumulty, January 21, 1919,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54, p. 194.

④ Hankey's and Mantoux's Notes of a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Four, President Wilson's Residence, Paris, April 28, 1919,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58,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81-182.

⑤ FLP to A.C.N.P., May 5, 1919, No. 1861; FLP to A.C.N.P., May 5, 1919, No. 1862,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58, p. 522.

⑥ "From Robert Lansing," May 7, 1919,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58, p. 522.

尔逊总统都害怕国际联盟成不了，因此，必须要在山东问题上作出妥协，才能保住国际联盟”。^①对于芮恩施而言，威尔逊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日本非常看重他们在巴黎和会中的国际地位。因此，日本才不会把所有这些唾手可得的利益拱手送人。让芮恩施感到非常失望的是，威尔逊总统牺牲了山东，用来换取日本对巴黎和约的接受。

6月7日，芮恩施向威尔逊总统提交辞呈，他在辞呈中写道，“在我任职期间，国内一直缺乏对远东局势的关注，对此，我一直深受其困……我一直许诺我们会提供援助，到最后都没有兑现”。^②当时，中方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其对道义原则的坚守都深信不疑。因此，威尔逊对日本作出让步和妥协，被视为对中国最大的背叛。要跟中方站在一起，还是要继续支持威尔逊总统，芮恩施现在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最终，他的跨文化身份认同超越了他的国家认同，芮恩施决定继续帮助北京政府。此后，北京政府聘请芮恩施担任政府顾问，直至1923年他在上海去世为止。

一般而言，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美国总统、国务院与外交官之间有不同看法、产生分歧是常有之事。不过，就芮恩施公使而言，他在二十一条交涉以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处置上与美国政府发生尖锐的意见冲突，却不能视为寻常的意见分歧，这确实与芮恩施本人强烈的学者身份意识和跨文化经历有关。要理解芮恩施的学者身份与外交官身份的冲突因由，大约与如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美国进步主义学者的时代精神气质。芮恩施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学者，有着强烈的“学术自信”和“学者观念”。当他把此种“学者观念”带入外交实践中，就很容易“固执己见”。第二，由于一战导致远东国际秩序失控，中美关系处于危机时刻，这种“危机性”客观上加剧了芮恩施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第三，芮恩施的个性禀赋和他的跨文化研究经历。在中美关系史上，跨文化经历越丰富的美国外交官，其在对华政策和价值观念上越容易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如19世纪末长期担任驻华公使的查尔斯·田贝（Charles Denby）以及二战后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③凡此种种，兹不赘叙。

三、身份尴尬的北京政府顾问

作为一个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芮恩施有一种很强烈的历史意识，那就是要促成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更为亲近的友邦关系。^④所谓“跨文化者”，是指跨越国界和文化边界的“交际者”，并与其他国家和文化体系的成员相互接触，在此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建构“跨文化身份认同”；这些“跨文化者”不仅熟悉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而且对异域文化和风土人情有深切的体认。^⑤芮恩施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而且长期在中国生活，由此赋予了他的“跨文化者”身份。

自19世纪以降，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确实不乏其人，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和司徒雷登等人，但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又显得与众不同。尽管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也具有某种

①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 360.

②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 366.

③ David L.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44-145.

④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99.

⑤ 戴晓东：《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

“学者身份”，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体学者”作用于中美文化交流，而芮恩施则是有意识地凭借美国政治学会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学术网络来对中美关系施加“集体性”的学术影响。^①在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与其有密切交集的美国政治学会同仁如古德诺、韦罗贝、精琦、穆尔等人都先后被北京政府聘为政治或法律顾问。^②这种现象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确属非同寻常。

在时人看来，芮恩施对中美邦交的促进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学者身份，而不是其外交官身份，如时论所言，“与各界华人交情密切，尤与归国留学生融洽无间者，首推芮恩施公使。中国爱国及抱进步主义之官员皆信任博士，凡值国家及国际问题辄向之商酌。彼等实视博士为友，不视为外国政府之正式代表。留学西方归国学生尤视彼为彼等之领袖，时时向之析疑问难。”^③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在1920年9月17日正式授予芮恩施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还有美国哲学家杜威，此事被视为中国学术界“空前之举”。^④

在美国外交决策层存在着一股改革的力量，他们有非常清晰的文化目标，就是要把美国理想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和文明之中去。^⑤这一传统同样体现在芮恩施身上，他对中美之间的未来抱有非常乐观的期望，他说，“只要你对她有深入的了解，注意到其传统及其社会和工业力量的源泉，你就会坚信，中国会在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⑥美国应当耐心地等待现代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进步。作为中美之间沟通的桥梁，以芮恩施为代表的“中国通”所处的位置有时候是很脆弱的，甚至还有可能是有危险的。一方面为了维持跨文化的身份认同，他们不得不刻意与中国文化保持适度距离，以便能够更好地应付同僚对他们“已经被外国同化”的疑虑；^⑦另一方面因语言、文化上的交流障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往往是中国留学生的欧美留学生。但是，欧美留学生因为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这可能会让他们在中国国内不那么“接地气”，从而限制了这些“中国通”对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思想和文化潜流缺乏更为深刻的理解。^⑧因此，芮恩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点盲目的乐观。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芮恩施在帮助中国的努力上有非常理想化的一面。在出使中国期间，他继续建构中美特殊关系的神话。换言之，他努力在中国塑造如下一个形象：美国是老师、恩主，而中国则是学生、受惠者。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乐于接受中国表达的敬意和尊敬，也乐于将自己视为一个恩主，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一迷思让他们不愿意正视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然兴起的事实。1922年，芮恩施出版了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这本书不但是芮氏努力建构中美特殊关系神话的一部分，也是他作为一个跨文化者所记录的关于跨文化交流体验的心路历程。总之，芮恩施既是中美关系的“创造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在华六年的公使经历，对芮恩施的国家观念、自我认同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对他来说，实际上跨文化身份变得更为重要。欧美同学会的会刊曾如是评价说：“他的外交活动建立在国际

① 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② Charles McCarthy,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ractical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ice," p. 318.

③ 《美报纪芮公使在华之成绩》，《申报》1919年9月9日，第7版。

④ 《记北大第二次授予学位典礼》，《申报》1920年10月20日，第6版。

⑤ Paul Gordon Lauren, ed.,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 p. 93.

⑥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 vii.

⑦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302.

⑧ John R. Eperjesi,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Vision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American Culture*, Hanover, N. 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5, pp. 98-99.

间的相互理解、坦诚和公正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也只有这种（国际）精神才能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① 正是因为这些信念，才使得他在美国驻华公使任上感受到不同身份在其身上碰撞时所产生出来的冲击力。1919年芮恩施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职务，此时他终于得以放下公职所带来的种种羁绊，实现他最渴望的身份认同——一个跨文化者的身份认同。作为一名“老中国通”，芮恩施与后来的美国中国通一样，都希望“人们能够自由地彼此沟通，而不必考虑国界的藩篱”。^②

芮恩施一直对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抱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离任前曾与北京政府代理教育总长傅增湘商谈中美两国大学交换教授事宜，他认为此举可以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瑰宝”。^③ 他还曾向大总统徐世昌建议，“中美两国国民感情欲期更加融洽，必从文化着手。例如，梅兰芳假能至美一游，以其绝艺表现中国文化，必能使美国人增进重视中国、爱慕中国之心。”^④ 诚然，芮恩施作为外交官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上是成功的。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他对现实政治又有着天然的兴趣，他无法离开中国政治。故而，芮恩施在离任之后仍时常发表批评中国时局的文章，无形之中介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⑤

然而，在政治现实中，中国当时分裂成两大政府：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中国南北之间进入分裂和混战境地。对于美国及其他列强而言，哪个政府才真正地代表中国，显然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列强仍然承认的是北京政府。但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州正在成为许多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心向往之的新政治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芮恩施仍然选择担任北京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北京政府顾问身份被公开之后，便招致中国公众舆论的非议。最后，芮恩施只好通过他的好友中美新闻社社长克劳（Carl Crow）在中国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辟谣说：“余不欲自辨，惟对于一种特别之诬蔑，则不能不欲吾之友人知为绝对无根，全不确实。凡有人谓吾曾以任何书面或口头说，对任何中国政界或非政界之人表示意思，欲为中国政府之顾问者，余皆视为完全捏造，不负责任之谈。”^⑥

树欲静而风不止。1921年9月12日，广州政府领袖孙中山的私人代表马素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芮恩施毫无疑问地在支持北京政府。马素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现在是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作为顾问为北京政府效劳；他在华盛顿有住处。我认为，美国公众应当了解这一事实。不是说，我认为芮恩施博士必然会应为他目前所担任的政治职位而怀有偏私，但是公平起见，他在作出和中国有关的声明之时，必须要提到他和北京政府的关系”。^⑦ 1922年下半年，蔡元培、胡适、罗文干、王宠惠等欧美派学人提出“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鼓吹学者从政；芮恩施正巧在此期间访问中国，并与胡适派学人群密切往来，胡适派学人群提出的“好人政府”主张似乎让他看到了美国进步主义在中国即将实现的愿景。^⑧ 事实很清楚，芮恩施和胡适派学人群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前途都过于“天真”，他们不仅高估了学者改革政治的能力，也无法正视彼时已经方兴未艾的以中共为代表的革命新潮流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胡适派

① “In Memoriam,”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VII, no.2, April, 1923, p.140.

② Paul Gordon Lauren, ed.,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 p.95.

③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383-384.

④ 南山：《梅兰芳小传》，《申报》1923年11月1日，第8版。

⑤ 芮恩施：《对于中国时局之建议》，《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1920年9月，第111—116页。

⑥ 《芮恩施博士之声明》，《申报》1920年3月14日，第7版。

⑦ “Answers Dr. Reinsch For Sun Yat-Se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21.

⑧ 《芮恩施来华》，《申报》1922年8月4日，第13版。

学人群的“好人政府”主张的破产也预示着以芮恩施为倡导的美国进步主义在中国试验的失败。诚如中共早期刊物《向导》所言：“我要警告议员学者们：你们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呵！芮恩施此次来华的使命，一面是为新银团游说，一面是巩固外交系的亲美政府，更欲外交系以外罗致一些名流学者入其彀中。”^① 芮恩施的北京政府顾问身份遭到中国内部革命力量的批判，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跨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现实之间是格格不入的。

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与北京政府之间的金钱雇佣关系难免让人觉得他所标榜的跨文化认同不过是掩盖其个人经济利益的“遮羞布”。事实上，芮恩施是北京政府高薪聘请的政府顾问。^② 尽管北京政府在五四运动之后财政上濒于破产，但其支付芮恩施的薪酬每季度竟高达五千美金，这笔费用由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转交给芮氏本人。^③ 作为北京政府顾问，芮恩施却常驻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北京政府进行各种游说活动，确保美国政府支持北京政权。^④ 实际上，他在华盛顿的政治活动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戒备。1922年8月10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雅各布·舒尔曼专门为此询问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婉转地表达了对芮恩施与北京政府来往密切的不满。^⑤ 归根结底，芮恩施的复杂身份使得他在一个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时局下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在担任驻华公使期间，他的学者身份意识经常使其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相背离；而在担任北京政府顾问期间，他的跨文化身份认同似乎又逾越了美国政府所限制的美国人参与中美关系活动的一般范畴。

如果我们对芮恩施出使中国的经历作一个总的回顾，可以看到，虽然他本人并不认可“美元外交”，但是在履行其公职时，他还是非常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资金方面对中国予以支持。当他看不到华盛顿有这样作为的意愿之时，他只能选择辞职。威尔逊总统尽管一再强调美国对中国担负有道义责任，但是在具体到施以援手层面，基本上就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了。^⑥ 特别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他本人出尔反尔，直接造成中国公众对他丧失信心，客观上促使中国人另辟蹊径，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3年1月26日，芮恩施在上海病逝。他的临终之地是上海而不是其家乡美国。对于这样一个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的学者而言，他的去世可称是“死得其所”。北京政府对芮恩施的评价是：“芮前公使于我国感情素洽，故于其卸任后聘为顾问。上年华盛顿会议亦有襄助之力。兹既在沪病故，拟请大总统派员致祭，以示优异。”^⑦ 考虑到芮恩施与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国民党人对他的评价算是宽容的、理性的，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认为：“芮恩施博士对于中

① 只眼：《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向导》1922年第4期，第8—9页。

② 《延聘美国博士芮恩施为顾问抄送合同底稿希查照备案由》，1919年9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01。

③ 《函复芮恩施顾问本年夏季薪金即照发请查照由》，1921年8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27。

④ 《探寻芮恩施博士来京使命事》，1922年8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34；详见《芮恩施薪水事》，1922年11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41。

⑤ 《探寻芮恩施博士来京使命事》，1922年8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34。

⑥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pp.81,102,213,214,355; Charles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4, pp.187-189,193-194.

⑦ 《铨叙局呈复前顾问芮恩施恤典一案》，1923年2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01—13—045。

国，向抱乐观态度，他以为新中国底建设，期在不远；虽然也热望中国统一，但认为现时的纷扰，为创造中国所必经的途径……非但如此，博士以为中国正有事可为，所以抛其家乡，远居我华，以其眼光所见到的新兴味，欲赞助中国人的新动作。我们对于博士，可认为新中国底良友。”^① 英国著名记者濮兰德则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层面评价了芮恩施的事功，他说：“芮恩施是在为促进中美关系的谅解而献身。”^②但是，到了冷战年代，美国舆论就转而认为芮恩施的“跨文化认同”背离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他在出使中国期间的外交行动是“错误的，值得批判的”。^③

芮恩施在中美关系上的三种经历是一种矛盾的经历，这种矛盾性源自他的跨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出使中国期间，正好遭逢一战爆发和远东国际关系陷入危机状态，芮恩施的学者身份和跨文化认同使其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和国际冲突，他的国家身份认同陷入危机，他希望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跨文化”和“自我人格”的再整合。^④ 他的跨文化认同经历表达了一种新的身份归属，表现在具体层面上就是他在 1919 年辞去驻华公使之后仍然担任北京政府顾问，以便在此不断的互动过程中重塑其跨文化身份认同。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曦，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周学军）

① 际安：《追悼芮恩施博士》，《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30 日，第 11 版。

② J. B. P. , “Dr. Reinsch Gave His Life for China and America,” *The Weekly Review* , Feb. 3, 1923 , p. 380.

③ Alan E. Kent , “Down from the Ivory Tower: Paul Samuel Reinsch, Minister to China,” p. 114.

④ P. S. Adler ,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Man,” in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ed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pp. 410-422.

than morality and replacing moral consciousness with political achievement, they enabled Japanese culture to shed “barbarism” and enter the Sinosphere, offered Japanese ethnocentrism principled support, and perfecte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s ethnocentrism, with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course of the country’s historical progress.

Crossover: Paul Samuel Reinsch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 Experience in China-US Relations

Ma Jianbiao and Lin Xi (140)

In the history of China-US relati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 there was no lack of figures who combined the roles of scholar, diplomat and cross-culture communicator, such as Samuel Wells Williams,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John Leighton Stuart, etc. However, the changing times meant Reinsch’s experience in these roles was unique. His border-crossing experience epitomized the American scholars who engaged in politic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s a scholar, Reinsch’s academic thinking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US Far East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he exerted academic influence on China-US relations throug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He worked both as a scholar and a diplomat to handle the crisis in China-US relations during the World War I, which faced him with a dilemma over his own identity. A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or, Reinsch had a praiseworthy desire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elping” the weaker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stance of a strong American culture, but the result was counterproductive. Before and after becoming ambassador to China, Reinsch and his fellow APSA scholars were active in the China-US diplomatic arena, devoting themselves to establishing China-US relations with a strong academic flavo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moral values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that Reinsch advocated were in essence still “Western values” representing the strong American culture.

Criticism and Debates

An Investigation of Qatun Sīnī: With Comments on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Khitan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Bai Yudong (158)

Qatun Sīnī, an ancient place documented in the *Dīwān Luḡāt at-Turk*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was located east to Hami. It had the same latitude as Hami does, so it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the Zhaojun Tomb,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Hohhot. On the circular map in *Dīwān Luḡāt at-Turk*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Ötūkān is near the origin of the Irtysh River. But discussions abou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Qatun Sīnī based on this information suffer from a deviation. Taking Zhaojun Tomb as Qatun Sīnī is a mismatch in name and reversed in logic. In contrast, it is reasonable to view Qatun Sīnī, whose people once fought with the Tanggut according to *Dīwān Luḡāt at-Turk*, as a city located within the area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artars in the Mobei region. There did exist in the Monan region a path connecting Khitan to Xi Xia and the Kara-Khanid Khanate. But this route in question, based on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started from Shazhou, passed through Ötūkān in Mobei and Qatun Sīnī and finally reached Khitan; this was the situation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Historical Notes

Reexamining the Text and Thought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Kīng Zhao Destroys His Palace*

Huang Guohui (171)

The Sel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Seen Through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Shen Gang (178)
